

《历史研究》

六十年论文选编

高翔 主编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研究》

六十年论文选编

高翔 主编

李红岩 路育松 副主编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研究》六十年论文选编/高翔主编,《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61-4444-2

I. ①历… II. ①高…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1766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史 河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70
插 页 2
字 数 1418千字
定 价 22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历史研究》历任主编 及本届编委会名单

1954—1960 年

主 编 尹 达

副主编 刘大年

1961—1966 年

主 编 黎 澍

1975—1982 年

主 编 黎 澍

1982—1985 年

主 编 庞 朴

1985—1988 年

主 编 徐宗勉

1988 年

主 编 徐宗勉

副主编 田居俭

1988—1992 年

主 编 田居俭

副主编 阮方纪

1992—1994 年

主 编 宋德金

副主编 阮方纪

1994—1997 年

主 编 宋德金

1997 年

主 编 宋德金

副主编 张亦工 高世瑜

1998—2001 年

主 编 李新达

副主编 张亦工 高世瑜

2001—2002 年

主 编 张亦工

副主编 高世瑜

2002—2003 年

主 编 张亦工

副主编 王 和 徐思彦

2003—2007 年

主 编 徐思彦

副主编 王 和

2007—2008 年

主 编 徐思彦

副主编 路育松 王 和

2008—2009 年

主 编 高 翔

副主编 李红岩 路育松

2009—2010 年

主 编 高 翔

副主编 周溯源 李红岩 路育松

2011—2013 年

主 编 高 翔

副主编 李红岩 路育松

2014—

编委会主任 高 翔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卜宪群 王 巍 王建朗 刘庆柱 邢广程 宋镇豪

张顺洪 李红岩 李国强 周 群 周溯源 赵文洪

高 翔 舒建军 路育松

主 编 李红岩

副 主 编 路育松 周 群 舒建军

始终引领当代中国史学的前进方向

——写在《历史研究》创刊六十周年之际

高翔

今年,《历史研究》迎来了创刊60周年。60年前,肩负着领导新中国建设艰巨重任的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这是一份在特殊历史时期以特殊方式诞生的学术刊物,从一开始它就被赋予了神圣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引领当代中国史学的前进方向。

60年,风雨兼程。《历史研究》和新中国史学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段曲折但不失辉煌的历程。深刻反思、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将使我们获得宝贵的历史教益。

第一,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史学的旗帜和灵魂。随波逐流,不是优秀学术刊物的风范;勇开风气、引领学术,是其职责所在、尊严所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每一种学术形态都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当代中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萌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中,勃然崛起,逐渐成为进步学术的主流。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唯物史观占领史学阵地,成为理论建设的重要要求,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历史研究》应运而生,郭沫若在发刊词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就请从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一门科学方面努力达到实际的成果,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的学习吧。”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历史研究》高举唯物史观的旗帜,辟除榛莽,努力开辟中国史学的新天地。十余年间,它刊发了胡绳、侯外庐、范文澜、尚钺、黎澍、日知、白寿彝、刘大年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名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带动了整个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史学家们从社会形态研究的角度,以开阔的视野,对人类历史进行新的全方位审视,尤其是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朵金花”展开的研究和讨论,不但使一批千百

年来被忽略、被遗忘的历史领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一大批沉沦埋没、几近湮灭无闻的历史资料、历史真相重见天日，而且，推动着史学界建立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体系。这一崭新的学术体系，将中国现代史学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考经证史为特征的传统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和以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为指导、以实证为特色的近代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史学家们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指引的方向，以严谨求是的学风，钩深致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了人类社会变迁的内在轨迹，比较准确地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中国社会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具有自己鲜明民族特色的独特历史道路。正是在这一宏伟的、史诗般的学术进程中，古老的中国史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以现在的标准看，尽管新中国史学包括《历史研究》本身，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教条主义等种种失误，但毕竟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崭新学术话语体系，这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始终是当代中国史学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其最有价值的学术个性。

第二，探索历史规律是新中国史学的本质追求。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其最显著的学术特点是实证。但实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历史学的真正使命是探索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文明的提升提供借鉴与参考。真正的史学家，从来都将认识人类之命运作为自己全部学术活动的出发点，他们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清儒章学诚强调“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反对离事而言理，即充分体现了史学在真理探索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高层次的史学活动，从来都是思辨性的，充满了理性的睿智。

创刊伊始，《历史研究》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积极引导史学界投身到历史规律的探索中来，投身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中来。在这场深刻的学术革命中，《历史研究》是参与者、引领者和推动者。除了积极引导对“五朵金花”的讨论外，《历史研究》还陆续刊发了有关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历史人物评价、唯物史观科学性、中国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国革命何以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带有规律性认识的文章，对开创新中国史学研究新局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研究》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推动史学界开辟新领域，引进新方法，提出新理念。正是在《历史研究》的引领下，社会史、环境史、文化史、区域史等一大批新领域被开辟，一大批新资料被发现，人类历史以富含变化的方式向人们呈现出多层次、多维

度的宏大场景。史学家笔下的社会生活，更全面、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应该说，这一状况和过去将历史规律简单化、社会形态片面化相比，是一次了不起的学术飞跃。

毋庸讳言，每一次学术进步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甚至有可能以局部领域的退步为代价。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片面推崇考据、淡化理论、否定规律等现象，在史学界有所蔓延。一些所谓新方法、新理念，浮华多于实际，没有也无法重写历史，反而将历史搞得支离破碎。史学界对历史细枝末节的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往往遮蔽了历史的真相。事实上，考据学不等于历史学，碎片化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面对异常复杂并且充满变化的人类社会，人们不禁要问：资料是否等于历史？“事实”是否等于真实？史料罗列难道真可以代替理论概括？细腻入微的盲人摸象真可以让我们获得大象的全局甚至发现其内在规定性？

碎片化的结果，必然是见孤木以为森林，拾芝麻以为珠玑，甚至用精心挑选的资料碎片歪曲和篡改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如果人们忘记或漠视规律这一终极关怀，试图用碎片叠加的方式重塑历史，那么，其着力愈多，离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的本质追求愈远，最终会迷失在由大量资料碎片组成的汪洋大海中。

毫无疑问，克服碎片化的出路在于重建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本质与规律的信心，学会从长时段的视阈、全面的视阈、发展的视阈对待历史，这是严肃的历史学家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历史研究》始终秉承的基本品格。

第三，经世致用是新中国史学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在人类历史进步的长河中，史学应该位于激流深处，推波助澜；而不是站在岸边，冷眼旁观，更不能逆流而动。史学研究，与其说是面对过去，不如说是立足现在，面对未来，即所谓“述往事，思来者”。

《历史研究》自创刊以后，就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将推动学术繁荣与服务社会发展有机统一到办刊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虽然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学习和宣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在学术界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封建史观残余、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在知识分子中仍然具有一定市场。《历史研究》自觉承担起在史学界确立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时代责任，它以学术讨论和争鸣的方式，引导史学家们学习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中国史学的面貌为之一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历史研究》配合全国上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积极策划了一批揭露“四人帮”历史罪行以及解放思想的文章，推动了学术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理论和学术氛围。最近三十余年，随着社会矛盾的凸显，环境治理、医疗卫生、农村问题、灾害防治等逐渐摆在人们面前。《历史研究》主动介入现实问题，引导学者通过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良策。近年来，《历史研究》专门策划了环境史笔谈，陆续刊

发了灾荒史、医疗史、疾病史、城市史、乡村建设史等具有现实感的论文。这些主题，既代表着国际史学发展的前沿方向，又对中国当代治理具有启迪意义。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经世致用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中国史学界在服务现实上没有少走弯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影射史学，粗暴地践踏了历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学术尊严。但问题在于，以史经世和庸俗史学是完全对立的。影射不是经世，奉承、迎合也不是经世，为一时之需别有用心地歪曲、篡改历史，更不是经世。真正的以史经世，讲的是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激情的统一，它立足长远、服务大局，努力为社会进步提供严肃的历史镜鉴。在这方面，史学界包括《历史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栉风沐雨 60 年，和新中国学术一样，《历史研究》的道路也非一路畅通、凯歌行进。改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历史研究》刊发了一些具有那个时代鲜明色彩的文章，甚至伤害了一些学者，妨碍了正常的学术探索。然而，这一责任不能完全由《历史研究》承担，我们无权要求《历史研究》做它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最近三十余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急剧变革的社会环境，面对形形色色的新思潮，面对各种学术流派的相互激荡，面对学术辞藻、方法、手段的不断翻新，《历史研究》面临着新的选择、新的挑战 and 考验：如何卓有成效地引导中国史学界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坚守自己的学术理念、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如何以更大的理论勇气，探索新问题，形成新观点，独抒己见，切磋砥砺，使史学更有生机、更具激情、更富活力；如何激励学者自觉地承担起时代的责任，服务国家和民族，做到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如何激浊扬清，使我们的学风一归荡平正直之道，使学者更加包容，容得下批评与异议、更加冷静，不为近利所动，不为浮名所惑，潜心学术，着眼未来；如何推动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更加自信、更具尊严，既不妄自菲薄，亦不妄自尊大，为人类文明的提升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所有这些，都是《历史研究》必须认真思考、努力回答的时代问题。

岁月无情，赤诚不改。过去 60 年，《历史研究》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新中国的史学史，今后，它也将如此。这一刊物的独特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它代表着、见证着当代中国史学的良知、品格和未来。

目 录

开展历史研究 迎接文化建设高潮

- 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 郭沫若 (1)
-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本刊评论员 (5)
- 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朱佳木 (8)
- 笔谈：中国环境史研究 朱士光、王利华等 (19)

-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 尚 钺 (57)
-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 吕振羽 (97)
-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林甘泉 (106)
- 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宁 可 (133)
- 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 马克垚 (160)
- 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 于 沛 (186)
- 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瞿林东 (194)
-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问题 卢钟锋 (203)

论西周是封建制社会

- 兼论殷代社会性质 徐中舒 (220)
- 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 金景芳 (247)
- 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 金景芳 (258)
- 小孟鼎与西周制度 李学勤 (274)
- 国家形成的标志之管见
- 兼与“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商榷 王震中 (285)

- 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 翦伯赞 (292)
- 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 侯外庐 (312)

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	王思治 (337)
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	田余庆 (361)
北魏龙城诸后考实	李 凭 (373)
论韩愈	陈寅恪 (391)
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	张国刚 (400)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邓广铭 (414)
宋代籍帐制度探析 ——以户口统计为中心	戴建国 (420)
文化整合与吐蕃崛起	王小甫 (447)
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吴 晗 (472)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	傅衣凌 (496)
论康熙	刘大年 (518)
元代的海外贸易	陈高华 (536)
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	吴承明 (547)
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	李治安 (559)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胡 绳 (584)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黎 澍 (593)
五四新文化运动	丁守和 殷叙彝 (620)
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	余绳武 (656)
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章开沅 (675)
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	龚书铎 (686)
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	汪敬虞 (699)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历史环境	胡绳武 (711)
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	李文海 (726)
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	金冲及 (743)
晚清华北乡村：历史与规模	王庆成 (772)
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苏智良 江文君 (785)
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	吴于廑 (804)
史诗《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与军事民主制问题	日 知 (823)
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	齐思和 (835)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季羨林 (873)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史学	郭圣铭 (882)
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	王养冲 (899)
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	齐世荣 (918)
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平等派对选举权的主张	王觉非 (936)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	张芝联 (950)
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罗荣渠 (962)
印度中世纪早期国王赐赠土地与封建制的产生	黄思骏 (982)
二十世纪英国政治制度的继承与变异	钱乘旦 (999)
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和规范	彭小瑜 (1016)
“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	李剑鸣 (1032)
关于“武士道”死亡价值观的文化检视	韩东育 (1063)
古典历史的基础：从国之大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	晏绍祥 (1085)
编后记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 (1105)

开展历史研究 迎接文化建设高潮

——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

郭沫若

中国有长远的、内容丰富的历史，是值得我们夸耀的。几千年以来，我们的祖先定居在亚细亚大陆东部的温带地区，发展了创造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绵延不绝地不曾中断，文物和史籍之多，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这些都是勤劳而有智慧的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劳动者替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不仅应该加以尽心的爱护，而且应该加以很好的整理。

无可讳言，我们的历史文物虽然异常丰富，但差不多全部还停留在原始资料的阶段。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我们也产生了不少的历史专家，特别是像司马迁那样伟大的人物，在两千多年前，他就总结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而为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记录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规格，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然而前代的历史家们，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所限制，他们不仅不曾从长期的历史中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是适得其反。他们的史观是唯心史观。为了巩固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们企图把活生生的历史发展固定甚至倒立起来。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便是那种史观的公式化。他们要维持“正统”，便不能不维持“道统”。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是封建统治的脊梁，因而唐虞三代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史观之下，不仅历史发展受了歪曲，甚至连历史资料都被玉石混淆而轻重倒置了。历史成为封建帝王和地主阶级的起居注，劳动人民的创造遭受了不可宽恕的长久的埋没。

近百年来，中国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资本主义的科学文明逐渐动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堡垒。几千年来的封建骗局为现实所揭破，历史的真相才朦胧地有所显示：历史是发展而不是固定，历史是前进而不是后退。想依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用以改革中国社会的要求，受到强有力的促进。然而在中国逐渐觉醒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转进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它们的要求是把中国殖民地化，长期地停留在被榨取的状态。外来的侵略势力和内在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使得中国社会因而被

迫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坑里。这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便是由封建社会的唯心史观转变为买办阶级的唯心史观。“全盘接受，全盘西化”，便是这种观点的最后结晶。买办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比封建时代的历史家们更进了一大步：不是把中国的历史固定而倒立，而是把中国的历史整个抹杀了！

值得衷心庆幸的是，我们在今天要回忆几年前买办阶级统治下的中国情况，也就和要回忆几千年前的封建王朝的历史一样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解放了自己，建立了几千年来历史上所未有的人民作了主人的国家。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中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斯大林把它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成就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在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中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使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的思想武器，的确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过我们，要我们“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①。这是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1日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讲的话，到今天已经整整12年了。然而这就和在今天当面给予我们以指示一样。这本来是对于学习革命工作的一般的指示，而在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四年来，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在雄壮的革命进军中经过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宏大的自我改造的思想学习，对于这个亲切的指示，我们相信是有了更普遍的接受和更深入的体会了。

自然，学习是有一定的步骤的，学习更是没有止境的。今天我们历史工作者谁也还不能这样傲慢地说：我们已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了，我们已经能够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工作了。有谁能够这样傲慢地说，可能他就是天字第一号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踏实的学问，它欢迎诚恳谦逊的人，它欢迎勤劳不倦的人，它欢迎勇敢前进的人。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应用应该采取不断学习的态度。精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自然是很好的学习，但如从工作中切实地进行体验则可能是更好的学习。列宁早就说过：“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的思想所经历的途径并不像从前那些在秘密条件下工作的宣传员和著作家所经历的一样，而是经过他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7页。

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①我们就请从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一门科学方面努力达到实际的成果，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学习吧。

历史研究的资料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丰富的，而历史研究的需要在今天又相当的迫切。汉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的历史、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乃至世界史都需要我们以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解释。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很多方面，我们不仅还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甚至还不曾有过初步的接触。无限的材料摆在当前，还不曾切实地进行有计划的收集，材料听其自生自灭，可能有不少宝贵的成分已经消失了。就因为这样，我们在目前还得不到一部完整的通史或其他各文化部门比较精密的专史，那是一点也不足怪的。但在今天我们是迫切地需要有这样的研究和著作了。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中来体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不仅我们自己需要，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兄弟国家，乃至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进步的人民都有同样的需要。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而世界人民，特别是追求解放的人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会感到莫大的憧憬，他们想从这里求得解决他们本身问题的钥匙。然而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的，我们须得满足国内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上的白页写满，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

但是，我们并不想在目前就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有这样的朋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已经相当有把握，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而产生出“理论性的结论”来，那样的朋友和他的作品，在我们当然十分欢迎。但假使一时还得出“理论性的结论”，只要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甚至只要能够提供出“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都是我们所欢迎的。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只要是认真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工作。认真能够实事求是的人，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会逐渐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终于合辙。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经过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

我们就是根据这样的方针来编辑和刊行这个刊物的。我们取名为“历史研究”，用意也就在于把范围放宽一些，以展开历史研究的工作。“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②，这就是我们所遵守的原则。但只要所进行的“研究

① 列宁：《论统一经济计划》（1921年）。

② 《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

和解释”不违背“科学的历史观点”，也就有可能逐渐获得这样的观点。因而我们的范围虽然比较宽畅，但也并不是无批判的兼收并蓄。

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凡是抱着诚恳的态度、有心认真学习和研究的朋友们都请来参加这项工作吧。请把“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园地吧。它虽然一时还不能满足人们的过高的期待，但在今天的自由环境中，有着充分的阳光和养分，只要我们努力垦殖、毫不懈怠，我们一定可以使这个园地逐渐成为宏大的文化公园。

文化建设的高潮要紧跟着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了，各尽所能，责无旁贷。

1954年1月2日

（刊于1954年第1期）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本刊评论员

值此新春之际，本刊向读者推出一组旨在开拓新领域、组织新课题的论文和信息，吁请史学界扩大视野，复兴和加强关于社会生活发展的研究，“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治史有方的国度里，人们一向重视搜集、整理有关社会生活的史料，诸如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阶级和阶层的衣食住行、嫁娶丧葬、婚姻家庭、宗族聚落、风俗礼仪、观念规范、社团会党、宗教迷信、节令时尚等，并根据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对上述史料进行说明。这不仅在浩如烟海的正史、典志、方志、稗史、笔记、文集等古籍中不乏记载，而且在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察古鉴今、安邦治国“法宝”的经学中也有突出反映，如“十三经”之一的《礼记》，便是古代贵族立身行事的生活手册。到了20世纪20—40年代，伴随“西学东渐”后社会学的兴起，我国曾一度出现研究社会生活的热潮。当时，有一批侧重或专门研究社会生活史的著作和资料相继问世，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思勉的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①），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②，以及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还有瞿宣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萧一山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令人遗憾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殊不知，此言此行恰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非常重视研究社会生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社

① 此书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因与前三部构成系列，故并列于此。

② 此书第五卷上、中、下各册延至1958年方由中华书局出齐。